

历史上,也有些昏庸的官员,尸位素餐,毫无建树。那些庸官的故事,值得反思。

历史上那些著名庸官

模棱宰相苏味道

唐玄宗开元元年为宰相的卢怀慎,清正廉洁,不搜刮钱财,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。他当官以后,尽管身份高贵,衣服、器物上都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,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。得到的俸禄赐物,他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,随给随无,很快散尽,是个公认的好官、清官。

虽品行端正,廉洁无私,但卢怀慎政务上却毫无作为,是个典型的“无为”官员。任职期间,他自知与其同殿的名相姚崇相比,能力不在一个档次,因此,事务都推让给姚崇,自己则概不问事,姚崇说什么就做什么,当时人讥笑其为“陪伴吃饭的宰相”。就是这个无作为的伴食宰相,竟然在宰相位上混了3年。

唐朝还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宰相,是一个特会打太极、踢皮球的圆滑宰相。据史料记载,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,三度拜相,居相位9年。在中国的成语典故中,有两则成语与苏味道有关,一则是“火树银花”,一则是“模棱两可”。苏味道在处理政务时,善于向皇上陈奏,由于熟悉典章制度,他上朝言事可以不带奏章,只凭口头禀报,侃侃而谈。此人虽然才华横溢,能力也很了得,但出任宰相数年,却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建树,只是一味阿谀,圆滑于君臣之间,屈从附和,取容于世而已。他常对人说:“做官处理事情,不要那么一清二楚、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。否则,一旦出现差错,必然后悔,而且还会留下遭受处分和被谴责的后患。因此,凡事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。”故此,人送称号“模棱宰相”。

三旨宰相王珪

宋朝宰相王珪幼年失怙,全靠叔父王罕抚养成人。后来王珪官越当越大超过了王罕,王罕怕侄子膨胀,每次写信都嘱咐“以盛满为戒”。事后证明

王珪很听话,谨慎得都有点过了,完全变成了不作为。

北宋神宗时,王珪居相位16年,这十几年间,政务得过且过,无所建树,每每遇到朝廷大事,也不动脑筋,不献策略,只起个上情下达的作用。每次上朝呈送奏章时,跪拜皇帝高呼“取圣旨”;皇帝批阅后跪接曰:“领圣旨”;出殿见人曰:“得圣旨”。总之,事事依圣旨而行,惟上是从,成了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,世人称为“三旨宰相”。

浪子宰相李邦彦

北宋还有一位李邦彦,官至宰辅,是个富二代,人称“浪子宰相”。此人行为放荡,不理政事,只会享乐,一是喜欢踢球,其踢起球来,脚法细腻花样繁多,堪称大宋的“梅西”;二是喜欢写萃段子,但凡他写了新段子,就有老鸨来“买版权”,唱给客人听;三是喜欢交际,李邦彦喜欢呼朋引类到家里吃喝,同时,又乐善好施,每遇到有进京赶考的举子要接济,必出手大方,由于会搞人际关系,他官运亨通,进步飞快。成为朝廷重臣后,不干正事,专门研究关系学,在北宋末年“靖康之难”时,他成了投降派奸臣之首,加速了北宋灭亡。

棉花宰相刘吉

明朝的刘吉,官至大学士、内阁首辅(宰相)。当时的明宪宗皇帝不问政事,内阁和六部都是在混日子,一度有“纸糊三阁老”(即刘吉、万安、陈文)和“泥塑六尚书”之称。他在位上,尸位素餐,奉迎皇帝,勾结宦官,粉饰自己。他的拿手好戏是颠倒是非,精于营私,但凡有意见与他相左者,必一棍子打死。由于他不理国事,无所建树,屡屡遭到言官的弹劾,但这位大臣心理承受力超强,无论言官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。凭着超级耐弹力,竟得以占据内阁18年,其中任内阁首辅15年,最后博得个“棉花宰相”之名。

六不巡抚叶铭琛

公元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,战争开始后,巡抚叶铭琛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镇定。当英军3艘军舰越过虎门、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,叶铭琛正在阅看武乡试。他闻讯后微笑着说:“必无事,日暮自走耳。”次日,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,叶铭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,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,断言15日无事。

叶铭琛的镇定,来自他的巫术活动。原来他在总督衙门里建了一个“长春仙馆”,里面祭祀吕洞宾、李太白二仙,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语。其过15日无事,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。

面对敌军,巡抚叶铭琛的应对之策是:“不战、不和、不守、不死、不降、不走”,被称作“六不巡抚”。他不积极备战,却依靠迷信来退敌,最终广州失陷,叶铭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答,在囚禁中客死他乡。

古代如何治庸官?

如何对付那些“碌碌无为、尸位素餐”的庸官,历代都在“推陈出新”。明朝张居正的“考成法”很有代表性。“考成法”类似现在“目标管理责任制”,他的做法很有操作性,用“三字”概括,就是“稳、准、狠”。

以对六部尚书的考核为例,其管理办法是:首先将各尚书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,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(专门负责弹劾,不受本部门领导)、都察院、内阁留存;然后,各尚书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,分别亲赴给事中、内阁和都察院,对照账簿,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;最后,内阁、都察院、给事中等三部门,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,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,就按规定予以处分。张居正当政期间,按《考成法》,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。 (据《南京日报》)

唐代“高考”流行推荐 王维为考状元假扮艺人

唐代的“高考”试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不但不“弥封”,相反,考官们还会根据他们的推荐人递上来的“行卷”,与“高考”试卷相对照,来检验考生的“综合素质”,决定是不是录取该考生。所谓“行卷”,就是考生们在考试之前,把平时写的一些最得意的诗赋文章加以编辑,写成卷轴,带到京师,呈送给朝廷权贵或者社会名流,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的一种考试方式。据记载,它在唐朝的考生中非常盛行。

“相逢意气为君饮”的王维,20岁赴长安参加“高考”时,为了考中状元,拿着自己的“行卷”先投到唐玄宗的弟弟岐王门下。当得知太平公主已经将状元的头衔给了另一个文人张九皋时,王维知道自己没戏了,因为太平公主要比岐王的权势大得多。岐王就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,让他在太平公主举行的宴会上,装扮成伶人,给爱好音乐的太平公主弹奏琵琶,以此博取太平公主的赏识。

宴会那天,王维应手挥弦,意态潇洒,所弹的曲子哀婉凄切,动人心魄。太平公主听了,赞不绝口,又加上王维“妙年洁白,风姿郁美”,太平公主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。岐王趁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,说:“此生非只通音律,至于词学,无出左右。”公主问王维:“子有所为文乎?”王维即献上怀中的诗卷,公主览诵未毕,就大惊道:“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,以为是古人佳作,竟然都出于你之手!”于是急忙命王维换衣,待以上宾之礼。岐王便说王维希望此次“高考”能中状元,请公主多加关照。公主不假思索地答应了,立即派人把主考官召至府上,告诉他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。王维就这样中了进士第一名。

白居易也曾因“行卷”受益匪浅。据唐代王谠《唐语林》记载:“白居易应举,初至京,以诗谒顾著作况。况睹姓名,熟视曰:‘米价方贵,居亦不易。’及披卷,首篇曰:‘咸阳(离离)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’乃嗟赏曰:‘道得个语,居即易也。’因为之延誉,声名遂振。”

“行卷”当然要以精为要,切忌“臭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”,一般是几首出色的诗,几篇优秀的赋,就可以达到目的了。但也有连篇累牍,录入大量诗文的行卷。如杜牧的行卷,竟录了150首诗歌,皮日休更是惊人,十卷“行卷”里收录了200篇首诗文,真可谓是“赁居槐拶屋,行卷雪埋袍”了。

“行卷”打破了“一考定终身”的弊病,但由于行卷的优劣,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命运,不少人就在行卷上做起了手脚,偷窃抄袭、捉刀代笔之风一时盛行。武则天当政时期,曾下令用纸糊上考生姓名,但并没有形成制度。直到宋朝淳化年间,宋太宗才推行“糊名考校”法,糊住姓名、乡贯,决定所录取的试卷后,才拆开弥封,以“革考官私之弊”。 (据《广州日报》)

宋朝的减租运动:下暴雨、降大雪均减房租



宋政治昏暗、国力虚弱、物价飞涨、国将不国。另外,那些大字报上特别指出南宋房价太高、房租太贵,中产之家买不起,穷苦百姓租不起,从北方逃过来的人民没有立锥之地,居住成本远高于金国,大家如果想过上美好的生活,就应该推翻这个腐败无能的南宋朝廷,欢迎金国军队的到来。

这些大字报并不全是造谣,那时候的南宋确实人满为患,房价房租确实高得惊人,有房的江南土著改行做包租公,统统发了大财,而没房的新移民却只能勒紧腰带,默默忍受着高昂的房租,还有很多穷苦难民付不起房租,只能露宿街头。所以南宋百姓看了金国间谍张贴的大字报以后,立马产生了共鸣,一时间民心动摇,群情激奋。宋高宗见状吓坏了,立即发布诏令,减免江浙两地城市居民的房租。如果租住的

是公房,可以免交三个月的租金;如果租住的民房,可以只交原来房租的一半;如果房东胆敢多收,大家可以去衙门告他们,政府会给你们做主。

宋高宗这纸诏令减轻了广大新移民的负担,从此民心安定,政局稳定。同时这纸诏令也开启了南宋减租运动的先河。此后宋孝宗、宋光宗、宋宁宗和宋理宗在位时,都频繁发布减免房租的通知:夏天下了暴雨减租,冬天下了大雪减租,地震了减租,日食了减租,太上皇过生日减租,皇后生了大胖小子也减租。所以南宋遗老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说:“都民素骄,非惟风俗所致,盖生长辇下,势使之然。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债,或终岁不偿一鑪。”意思是临安城房租虽贵,但朝廷会给予减免,有时候一年到头都不用交一分钱房租。 (据《广州日报》)

南宋初年,宋金对峙,打了不少硬仗,打得金兵血流成河,也打得大宋国库空虚。眼见军事上不见成效,两国开始搞谍战:互派间谍到对方境内,刺探情报,散发传单,煽动群众,动摇民心。

宋高宗建炎三年,金国派出大批间谍,分别混进杭州、苏州、镇江、南京等江南重镇,夜里在闹市街头张贴大字报,一边宣传金国政治清明、国力强盛、物价低廉、河清海晏,一边攻击南